

## 空白

任林舉



「爸爸，我要吃肯德基！」學生請我吃飯，順便討論一個問題，但我沒想到他會把五歲的兒子也帶來。

學生不好意思地瞧了我一眼，轉頭搪塞他的兒子：「去，有餃子自己拿去吃。」

「我不吃，我要肯德基！」現在的孩子，從小吃慣「洋食」，比西方人還迷戀「西餐」。

看來，學生把吃飯的地點安排到中餐館，完全是爲了遷就我。我應當領他這個情，但我還是心中不快。

我不快，並不是因爲他那難纏的兒子，而是因爲另一個孩子——那個早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剛剛四歲就被日本人殺害的小金子。如果小金子活着，已經八十五歲了，很可能會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講述很多往事。

學生手裏拿着兩份材料，一份是一張老照片，一份是一頁發黃的檔案，都是影本。兩份材料都來自於日本佔領時期的「滿洲」檔案。那頁檔案上有四歲的小金子拒絕吃日本飯的記錄——當憲兵隊翻譯橫田拿着日本飯團給小金子吃時，小金子一邊用小手往外推，一邊說：「我不吃滿洲飯！」照片則是著名抗日自衛軍將領王鳳閣將軍被日本關東軍殺害前留下的一張「紀念」照。照片上，除了王鳳閣和他的妻子，其餘的都是日本軍官和日本僱傭的中國兵，稱「僞軍」。可是，照片上王鳳閣

將軍的右側，卻赫然留下了一個明顯的空位。

「怎麼證明這個空位是小金子被臨時拉出後留下的？」學生和我探討的其實是兩個問題：「那麼小的孩子怎麼會有那樣的境界？」

說實話，我並不喜歡學生的刨根問底，因爲我實在不願意提及與小金子有關的那段歷史，太殘酷啦！我是一個脆弱的人，最害怕殘忍地討論那些殘忍的事情。況且，我早就對他說過，我們理解不了小金子，是因爲我們的生命太小，這本身就是恥辱，如果再妄猜、妄斷就更可恥了。

提起小金子，我的心總如那張老照片，赫赫然就多出一塊空白。我甚至看不清之前的圓剛、獵殺、鮮血和淚水；聽不到王鳳閣將軍就義前最後的道別和慷慨陳詞；也聽不清之後來自民衆的震撼山谷的慟哭。

我的眼前只有那個在時光深處浮現出來的畫面：當行刑者山根長端着槍對準王鳳閣將軍的夫人張氏和幼子。小金子望着媽媽流淚的眼睛說：「媽媽，我不怕，你抱緊點我！」

小金子的命真是不好，那麼小就要面對死亡。如果他不被殺害，很可能會成爲一個時代的英雄。至少，不會讓一段歷史、一張圖片或很多人的心留下令人惶恐的空白。

「爸爸，我要吃肯德基！」學生的孩子繼續在鬧，我眼前一片模糊，感覺那幅照片上的空白開始放大，最後竟淹沒了整幅畫面，就像我那時的內心一樣，一片蒼茫。但人心和紙張有所不同，當空白太大時，就會生出酸楚和疼痛。

## 古人與斜槓人生

徐海娜

今年夏天，我回到曾經工作多年的城市福州，小住了幾天，照例去「三坊七巷」逛了逛，這是我每次回福州的必備保留節目。「三坊七巷」是福州南後街兩邊從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條小巷的簡稱，因爲曾經是福州老城社會名流聚居之處，因此保留有不少近現代名人的故居，例如林則徐故居、嚴復故居、冰心故居等。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我有幸因朋友之邀拜訪了其間一處私人博物館，這便是「嚴復翰墨館」。

嚴復，被稱爲中國近代啓蒙思想家和翻譯家，也是首任北京大學校長。說起嚴復，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率先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今譯爲《社會學原理》）、亞當·斯密的《原富》（今譯爲《國富論》）、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今譯爲《論自由》）、孟德斯鳩的《法意》（今譯爲《論法的精神》）等衆多啓蒙譯著。在這樣的光環之下，甚少留意到他其實也是一位書法家。

在「三坊七巷」中的郎官巷裏保留着一處嚴復故居，一九二〇年底到一九二一年深秋病逝之前，嚴復曾在此短暫居住。而我這次參觀的「嚴復翰墨館」位於南後街一處隱蔽的院落中，門口雖然掛着「嚴復翰墨館」的大牌子，進去卻是一間「嚴校長的故事」文創店，再往裏走，才是別有洞天的所在。

原本以爲不過是來看幾幅書法真跡，然而展館裏裝裱展出的嚴復書法作品數量之多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只能在驚嘆不已和目不暇接中粗粗瀏覽一遍。這裏是一間私人博物館，因屬私人收藏，尚未向社會大衆開放，展出的都是鄭志宇先生個人收藏的嚴復書法真跡，包括臨帖、信札、

對聯等，總量近三百幅之多。這些珍貴的文物曾在去年底被借到故宮博物院向大衆展出，構成了當時故宮「繹新籀古，光氣垂虹」嚴復書法特展的主體。據說鄭志宇先生爲這些藏品歷經無數坎坷，散盡家財，付出畢生精力，不禁令人感佩。鄭志宇先生希望這些藏品能讓人了解嚴復豐富的一生及其治學處世的思想。

在參觀嚴復翰墨館的時候，我的腦海中忽然閃現了「斜槓」一詞。「斜槓」一詞這裏指英語裏的「Slash」，這個概念出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寫的一本暢銷書 One Person / multiple careers: A New Model for Work / Life Success。在書中，作者提出一個問題：「Are you a『slash』？」作者稱，隨着科技的發展，朝九晚五的生活已經逐漸成爲過去，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對抗無聊、倦怠、不安全感和工作困境的解藥，那就是開啓每個人的「斜槓人生」。一個人可能同時是一個律師和大廚，一個人也可以同時是一個企業的CEO，也是一個盡職的媽媽等。一個人的職業身份可以是多種，人們藉着「The Slash Effect」可以獲得多種職業生涯的成功感和工作生活的平衡感。

然而，從古到今多少名人，都是擁有多重身份和多領域生涯的啊！嚴復就是啓蒙思想家／教育家／書法家。無數古人都這樣，在林語堂所著的《蘇東坡傳》中甚至描述了蘇東坡十八個身份，他說，「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

本來以爲是新時代的新事物，細想其實是個舊傳統。

非洲和歐美詩界一般將布魯特斯稱爲「抗爭詩人」，他本人則自命爲「行吟詩人」。行吟詩人一般指十一至十三世紀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現的一批民間抒情詩人。他們在各地浪遊，邊走邊吟唱。他們主要頌揚遊俠的見義勇爲和騎士對愛情的忠貞。布魯特斯大半生行蹤不定，歌吟不止。從這點上說，他確實像古時的行吟詩人。但是，他吟唱的內容與古時的行吟詩人迥然不同。他畢竟是一個反對種族主義的戰士，抒寫最多的是對種族隔離制度的譴責與詛咒，對種族自由與平等的嚮往與追求。因此，對社會的「抗爭」是他創作的「第一主題」，是他作品最鮮明的特色。他一再聲言：「我是個叛逆者，爭取自由是我的事業。」因此，他是一位新時代的行吟詩人，一位爲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四處奔波的行吟詩人。他的詩作

## 南非「抗爭詩人」布魯特斯

高秋福

名人堂中有不少曾經維護種族隔離制度的體育界人士，他決不能與他們沆瀣爲伍。二〇〇八年，鑑於他在詩歌創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南非政府決定給他頒發「詩歌創作終身成就獎」。實至名歸，他欣然接受了解說。

布魯特斯對中國人民懷有誠摯友好的感情。他曾對我說，訪華的時間雖短，但「身處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感到一切都很好，詩思不禁如流泉奔湧」。在北京的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在昔日皇宮之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在上海的農村和工廠，都留下他的詩作。他爬上長城，寫下這樣一首詩：「長城：／一個士兵／手捧鮮花一枝。」三行簡單的文字，是他感觸良多的記錄。他說，那個

## 北野武的小酒館

陸小鹿



一到夏天，我就情不自禁打開手機聽一首名叫《Summer》的歌，像一個應季的儀式。這首歌是日本影片《菊次郎的夏天》裏的主題曲。菊

次郎的扮演者叫北野武，同時，他也是這部電影的導演。所以，也可以這麼說，一到夏天，我就情不自禁想起北野武，因爲這個男人太獨特了，從來不苟言笑，由於車禍導致半邊臉面癱，看上去更像是個暴力的黑幫老大。但就是這個酷酷的老男人，居然又像文藝女青年那樣喜歡海，而且，除了會導演、會演戲、會主持，還會畫畫，愛把花朵插在動物的身體上，簡直就是有着「山羊般的暴躁和花朵般的純真」。

北野武還愛喝酒，常去赤坂「熊先生的料理店」和料理人熊先生邊喝酒邊聊天。聊着聊着，兩個人就做出了一盤「頂級料理」。這盤「頂級料理」，便是這個暑期我閱讀的一本影人隨筆——《北野武的小酒館》。

北野武和熊先生時而詼諧，時而嚴肅，他們聊到了生死、教育、人際關係、規矩、電影，直指現代社會病灶，喚醒大衆逆向思考。這本書，補充了我對北野武既有的認識，我發現了一個嶄新的北野武——

膽小的北野武。之前，在銀幕上，北野武一直是兇巴巴的硬漢形象。可讀了這本書後才發現，原來北野武竟是個膽小鬼。從學生時代開始，他就害怕死，因爲死很容易被別人遺忘，他不想什麼都沒做就



▲《北野武的小酒館》展示不一樣的北野武

死了。「無聊的人生我死都不要」，於是，已經讀到機械系大四的他決定退學，改做藝人。從此，誕生了導演北野武。

亦嚴亦柔的北野武。談到對孩子的教育，他主張「棍棒教育」。他說父親就是要做孩子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塊絆腳石，如果和孩子講不通道理，那就要打孩子屁股。但他又不是絕對的魯莽嚴父，後來他又說，「不要逼孩子去完成他不可能完成的事。」「如果孩子沒任何才能，至少要培養他有一顆堅韌的心。」嚴父背後潛藏着滿滿的溫情。

敢說大實話的北野武。他直言，年輕時總是緊張兮兮，很難爲競爭對手的成功感到高興。而年紀大了，因爲早已和對手拉開差距，優勢明顯，所以才能爲對手的成功由衷感到快樂。直言無忌的心聲，道出了當代普遍存在的來自同輩壓力的焦慮心理。

有怪癖的北野武。北野武說自己的怪癖是清洗廁所，每次看到廁所不潔，他就主動打掃，他一直記着母親的話：「你可以把潔淨之物弄髒，但你不能把不潔之物弄髒」。說到底，這就是規矩。所謂規矩，就是爲他人着想。所以，無論工作還是生活，北野武總是處處爲他人着想，守住心中的規矩尺度。

任性的北野武。北野武說他的電影從來不是爲觀衆拍的，而是爲自己拍的，他只在乎自己的興趣。一旦感覺無聊，就會自然而然對另一件新鮮事物發生興趣。所以，我們才得以看到風格多變的北野武，既有《那年夏天，寧靜的海》這樣的愛情片，也有《大佬》這樣的犯罪驚悚片，還有《阿基里斯與龜》這樣的劇情片……實際上，做到多變不容易，需要不斷探索，北野武以一己辛苦造福了觀衆的眼福。

總之，在熊先生的小酒館裏，最好的「下酒菜」就是北野武的奇談妙論。看完整一本書，感慨北野武活得太恣肆灑脫了。假若要我選擇一個詞來概括他，那就是——浪漫。就像他自己在書中說的那樣：「雖然辛苦，我還是會選擇那種浪漫的人生。即便是有機會讓我的人生重新來過，我想我還是會選擇那種會以幾億度的高溫飛速燃燒的人生。」

## 這條新聞，如酷暑吹來一陣涼風

郭一鳴



上周到西安，甫下飛機則感到一陣熱浪撲面，當地朋友笑稱，幸虧你們晚到幾天，這兩天才

三十七至三十八度，前些天是四十度！西安地處大西北，竟酷熱如長江沿岸的武漢、重慶等火爐城市！走在無遮無攔的古城牆上和大明宮前，烈日當空，大汗淋漓，幾乎可以感覺到體內水分被一點點蒸發！

近日媒體有不少關於世界各地熱浪肆虐和民衆消暑的報道，日本全國持續高溫酷熱，有老人在家裏開冷氣仍中暑身亡，西班牙氣溫破天荒達攝氏四十八度，芬蘭有超市通宵開放供一百名幸運民衆入夜避暑，有德國商家開放冷藏庫賣門票，入內嘆兩分鐘盛惠三歐元，而最吸引我的是一則關於韓國百年熱浪的新聞。

據報道，首都首爾本月一日錄得三十九點六度，打破該市一百一十一年最高溫紀錄，該市江北區氣溫更高達四十一點八度！可是，六十二歲的首爾市長朴元淳卻攜夫人於上月二十二日入住該區一間面積三十平方米（三百二十三平方呎）的天台屋，打算租住一個月體驗民情，以便制訂規劃紓解首爾貧富懸殊矛盾、推動均衡發展。報道稱，朴元淳租住的天台屋沒有冷氣，夫婦帶備總統文在寅贈送的一把風扇成爲唯一降溫工具，朴元淳每天下班後便回到天台屋，周末假日也在天台屋度過。

韓國名列亞洲四小龍，曾經創造「



▲首爾市長朴元淳（左）攜夫人入住天台屋，體驗民情

網上圖片

漢江奇跡」，人均收入逾三萬美元，但風光的背後問題不少，包括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等，據統計有四十一萬人口住天台屋、地下室之類蜗居，這四十一萬蜗居人口當中，首爾佔了百分之九十三，青年人更佔三成七。首爾居住環境已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情況與香港不遑多讓。朴元淳自付租金住天台屋親身體驗民情，沒料想遇上年年熱浪來襲，住天台屋變成一場災難，但這對市長夫婦堅持要住滿一個月。這條新聞，彷彿從天邊吹來一陣沁人心肺的涼風，令這個酷熱難耐的盛夏，變得讓人覺得不太煩悶。

與現任總統文在寅同一陣營的朴元淳，今年開始第三個首爾市長任期，韓國政壇盛傳朴元淳可能問鼎下屆總統，因此，不排除朴元淳入住天台屋有做秀的之嫌，其實農民出身的朴元淳是一個

非常接地氣的市長，但就算這回是做秀，這樣的做秀，相信首爾市民會十分受落。現代社會，政治人物的同理心比同情心更重要，同情心出於人性，基於道德，但因爲位置不同處境不同，有時政治人物的同情難免令人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同理心則出於理性，是解決問題的起點，朴元淳想到去親身體驗酷熱高溫下居住天台屋的感受，證明他有同理心，即使問題暫時未能得到解決，但足以讓四十萬蜗居市民充滿希望和期待。

香港的夏天也很熱，今年的夏天特別熱，香港也有不少天台屋、鐵皮屋、劔房，甚至有首爾沒有的籠屋，蜗居人口近二十萬，當中不乏買不起冷氣的家庭，不知道有沒有哪一位高官，或自認爲民請命的各個政黨人士，願意學朴元淳那樣帶同夫人去親身體驗一下呢？



非洲和歐美詩界一般將布魯特斯稱爲「抗爭詩人」，他本人則自命爲「行吟詩人」。行吟詩人一般指十一至十三世紀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現的一批民間抒情詩人。他們在各地浪遊，邊走邊吟唱。他們主要頌揚遊俠的見義勇爲和騎士對愛情的忠貞。布魯特斯大半生行蹤不定，歌吟不止。從這點上說，他確實像古時的行吟詩人。但是，他吟唱的內容與古時的行吟詩人迥然不同。他畢竟是一個反對種族主義的戰士，抒寫最多的是對種族隔離制度的譴責與詛咒，對種族自由與平等的嚮往與追求。因此，對社會的「抗爭」是他創作的「第一主題」，是他作品最鮮明的特色。他一再聲言：「我是個叛逆者，爭取自由是我的事業。」因此，他是一位新時代的行吟詩人，一位爲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四處奔波的行吟詩人。他的詩作

## 南非「抗爭詩人」布魯特斯

高秋福

名人堂中有不少曾經維護種族隔離制度的體育界人士，他決不能與他們沆瀣爲伍。二〇〇八年，鑑於他在詩歌創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南非政府決定給他頒發「詩歌創作終身成就獎」。實至名歸，他欣然接受了解說。

布魯特斯對中國人民懷有誠摯友好的感情。他曾對我說，訪華的時間雖短，但「身處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感到一切都很好，詩思不禁如流泉奔湧」。在北京的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在昔日皇宮之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在上海的農村和工廠，都留下他的詩作。他爬上長城，寫下這樣一首詩：「長城：／一個士兵／手捧鮮花一枝。」三行簡單的文字，是他感觸良多的記錄。他說，那個

解釋說，他在南非看到的士兵，「總是手持抽人的皮鞭、殺人的鋼槍」。而在中國，士兵是人民的子弟，把鮮花獻給他這個不相識的異國遊子。他接過花枝，不禁淚眼婆娑，當即寫下這樣三行字表達自內心的禮讚。他的訪華詩作總計三十多首，每首三五行。他說，他喜歡中國古典詩歌言簡意深、文近旨遠的表現手法，特別是絕句那種短小精悍的藝術形式。他把這些短章視爲學習中國古體詩歌的一次嘗試。北京那次會見時，他將部分訪華詩作的打字稿送給我，希望能在中國發表。我對他的信託甚感榮幸，但當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找不到任何發表的園地。「文革」結束後，我到非洲工作，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意外發現，他的訪華詩